

對中國人而言，此後的「國際」已面目大異，不同的人看見的和迎拒的「國際」可能很不一樣。

後來「反帝」愈來愈成為中國權勢競爭中「政治正當性」的必要條件，也是中國民族主義不可或缺的核心因素，這當然也可視為「國際化」的一種表現，但或不是徐教授所陳述的那種積極主動的參與。最重要的是，如果多少存在着正義和公理的那個「世界」不包括中國，中國或不能不尋求接近甚或建立一個新的共同體，且可能是一個否定當時「世界」的新世界。

當風光一時的杜威 (John Dewey) 於1919年6月來到北京，因學生運動仍在進行而不免感到寂寞時，這位躊躇滿志的哲學家面對一群「無需教誨」的學生 (杜威語)，真

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他或許深切地感受到了「威爾遜背叛」帶來的顛覆性轉折——無論就revolution的本義還是引申義來說，這就是一次革命。革命自然包括破壞，但其解放出的活力，也遠超出製造者和參與者之始所想見 (這是杜威稍後對蘇俄革命感想，參見John Dewey, “Leningrad Gives the Clue”, *The Later Works, 1925-1953*, vol. 3 [1927-28], ed. Jo Ann Boydston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4], 204)。以「資本主義的」或「民主自由的」西方為中心的「國際」對中國的拒絕，為那個杜威眼中半西方半東方的「新俄」在中國讀書人心中的崛起，起到了未必寫實卻能寫意的烘雲托月之功；初或朦朧，後來回味，實在意味深長。

威爾遜的「背叛」在很大程度上隱喻着「國際」對中國的拒絕。巴黎和會的結果明確告訴中國人：「世界」的確是一個外在的區域；而中國仍是國際政治中特殊的「例外」，亦即入江昭所說的「世界政治中遠東的隔絕」。後來「反帝」愈來愈成為中國權勢競爭中「政治正當性」的必要條件，但這種「國際化」或不是徐教授所陳述的那種積極主動的參與。

技巧性使然，抑或階級性使然？

● 李 翔



家近亮子著，王士花譯：《蔣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日本敬愛大學國際學部家近亮子女士長期從事中華民國史的研究工作，《蔣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是她的重要研究專著，在研究視角、方法等面向上均富有新意，對國內這一領域的研究，有一定的啟迪功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將其列入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文庫，2005年1月在中國大陸出版發行。

家近亮子的《蔣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分析領導着南京國民政府的國民黨，為何容許其敵對勢力共產黨的增長，並最終失敗，認為其基本原因是南京國民政府以及國民黨的權力滲透不夠。作者摒棄了革命史觀話語體系，即大陸主流學界對國民黨階級屬性的定性考察法，轉而從國民黨黨權擴散的技巧入手，診察南京國民政府喪失政權的根由。

全書由「前言」與「序論」統攝，正文七章分別從上層建築、經濟基礎、政黨運行等幾個領域展開討論，每個領域又都從非階級對立因素加以分析，為國民黨喪失政權尋找體制內黨權滲透何以不夠的各種技巧性解釋話語。

「前言」及第一章「序論」。作者把考察目光下延，縱向對比1949年後中共的統治方式，認為：作為典型的「以黨治國」統治模式，中共的統治，與其說是意識形態，倒不如說是佔絕對多數的黨員，以及像網絡一樣遍布全國的黨組織，雖有執行政策不徹底、黨的官僚腐敗等民眾不滿的問題，只要黨能給黨員提供社會資源，「黨的領導」這種體制今後還會繼續。受中共執政方式的啟發，作者得出該書主要設問在於分析「領導着正當政府——南京國民政府的中國國民黨，為何容許其敵對勢力中國共產黨勢力的增長，並最終失敗」的答案，即「其基本原因是南京國民政府以及中國國民黨的權力滲透不夠」。

作者得出國民黨失敗原因的結論，明顯摒棄了革命史觀話語體系，即大陸主流學界對國民黨階級屬性的定性考察法，轉而從技術性環節——國民黨黨權擴散的技巧入手，診察南京國民政府喪失政權的根由。作者認為黨權滲透的技巧性，同黨掌握的社會資源緊密牽連，而與階級屬性關聯淡薄。對社會資源範疇的特別關注，正是現代化解釋模式採取的一種理論策略，其目標是消隱革命史觀對階級矛盾的過份張揚，以塑造現代化解釋範式的唯一有效性。

第二章「孫文北京之死及其政治效果」，第三章「蔣介石的反共構建與四·一二政變」，第四章「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及其正統性的確立」以及第五章「南京國民政府中央權力機構的變遷與蔣介石」。作者認為：孫文之死成為三民主義解釋多樣性的主要原因，地方實力派自我詮釋三民主義，阻撓國民黨中央組織在華北等地的延伸，這成為國民政府在北方統治力度虛弱的根源。作者探究了蔣選擇1927年4月12日發動政變的個中情由，其得出的市民團體認可蔣介石反共的結論，與大陸主流學界對政變的解釋話語明顯背離。作者認為國民政府在時代潮流中，在國內、國際上獲得了來自政權外部的一定的支持及承認，得以確立作為政權的正當性。但黨的中央權力機構變遷頻繁，導致中央權力不穩定，阻礙了黨權向地方滲透，最終造成地方權力及整個政權體系不穩定。

作者採行現代化史觀，認可國民黨統治的正當性，故而特意重新詮釋革命史觀所竭力否定的「四·一二政變」，並將國民政府統治合法性消蝕的因素反覆歸結為地方實力派和黨內反蔣勢力持續不斷的抵制，為蔣介石及南京國民政府的失敗尋找體制內根由。

第六章「蔣介石『安內攘外』時期南京國民政府的國家建設及外交戰略」。作者選擇國家建設與外交戰略為重新評估的關節點，將「安內攘外」變更為多個歷史事件匯集的時間段，甩掉了以往革命史觀研究的窠臼。作者特意指出對「安內攘外」作出負面評價的根源：把此歸

結為面對日本侵略的不攘外和鎮壓「代表大眾意志」的中共革命運動。

作者意圖通過肯定南京國民政府在國家建設等領域取得的成就，來否定革命史觀對國民政府倒台原因的解釋範式，為全書的核心觀點——國民政府最終失敗的基本原因在於國民黨的權力滲透不夠——進行充分、合理的鋪墊。

第七章「關於中國國民黨黨員與黨費問題的考察」，第八章「南京國民政府權力滲透的一個側面——從黨的基層組織來看」。作者將政黨分為列寧型、孟什維克型、孫文型三種，把既強迫黨員承受財政負擔，又要犧牲個人一切的國民黨定為孫文型政黨，指出孫文型政黨運行模式是國民黨在大陸失敗的重要原因。在黨的組織化過程中，國民黨幾乎沒能動員民眾，組織工作以游離於大眾的形式進行。尤其在抗戰後，黨員過份沉重的工作和資金援助方面的負擔，引起大量黨員脫黨，使黨的基層組織遭受破壞，並成為丟失大陸政權的重要因素。

與革命史觀者對大眾動員的分析不同，作者沒有以民眾為考察對象，而是從黨員與黨的組織工作入手，重構國民黨丟失民眾的非階級因素，從另一個側面揭示了革命史觀的宏大敘事所忽略的某一面相。在這裏，作者似乎不排斥對革命性大規模社會動員的討論，但實際上作者並不打算為革命的動因提供體制外的解釋規則，因為這不是作者採行的現代化史觀及其闡釋領域之所在。

第九章「結論」，對全書主要觀

點進行總括，從結構上照應前文，體現了作者構建全書的縝密思維。

《蔣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一書，首先排斥大陸學界對相關課題的革命史觀分析法，轉而借助比較手法，通過與前後時間段類似歷史事件的比較，得出統領全書的核心觀點。考慮到全書是由作者公開發表的六篇論文彙集而成，且論文時限從1996年跨至2000年，可以想像作者對這一問題進行了長時間的嚴謹思索。因此，全書雖是不同階段的論文集，但卻看不出拼湊痕迹。相反，作者寫作風格一致，每章都由提出問題、分析問題、結語三個部分構成，章章圍繞國民黨權利滲透大做文章，反映了作者對該問題的嫺熟把握，更體現出其宏觀架構的過人能力。

不過，作者撇開革命史觀基於「階級」等概念的解釋，直接進行與革命範式相悖的論述，但由於作者沒有包容和檢討革命範式提供的理論前提，其新方法就同早先基於革命範式的解釋一樣陷入了片面的泥沼，形成了自身解釋範式的危機。坦率地說，作者運用現代化史觀營造出的解釋空間，同樣呈現出過度決定的色彩，這種單一的有選擇性的縱向比較所獲取的結論未必就符合事實。

家近亮子採行下延比較法，得出國民政府的失敗在於執政黨的統治技巧不夠成熟，沒能將黨組織撒播到旻旻兒兒，致使黨員數目極為單薄，缺乏政策的執行者。這一結論固然新穎別緻，但值得仔細推敲，全書一個明顯的薄弱之處是：既然考察對象是蔣介石及國民政府

作者將政黨分為列寧型、孟什維克型、孫文型三種，把既強迫黨員承受財政負擔，又要犧牲個人一切的國民黨定為孫文型政黨，指出孫文型政黨運行模式是國民黨在大陸失敗的重要原因。在黨的組織化過程中，國民黨幾乎沒能動員民眾。尤其在抗戰後，大量黨員脫黨，黨的基層組織遭受破壞，成為丟失大陸政權的重要因素。

家近亮子此書一個明顯的薄弱之處是：既然考察對象是蔣介石及國民政府失敗的主要根由，則其對立面——作為勝利方的毛澤東及根據地——至少不應完全脫離作者的研究視域。民國史的研究，視野只盯住國民政府而不去關注同時並存的根據地政權，只看見了國內而未留心對國民政府有重要影響的他國政權，所提取的論點都可能偏頗之處。

失敗的主要根由，則其對立面——作為勝利方的毛澤東及根據地——至少不應完全脫離作者的研究視域。

縱向比較易於弄清事情的來龍去脈，使歷史研究具有了動態美感，但也會使作者因目光局限於「上下」而忽視了「左右」，只注意了本體而淡忘了客體。尤其是民國史的研究，視野只盯住國民政府而不去關注同時並存的根據地政權，只看見了國內而未留心對國民政府有重要影響的他國政權，所提取的論點都可能偏頗之處。因而適度的橫向比較在民國史、根據地史，甚至汪偽政權史的研究中都是大有必要的，它能體現史學研究的開放心理和兼容性。不能單純為了去革命史觀，為了構建作為主體的國民政府史或中國國民黨史，而將中共黨史摒棄於視野之外。

蔣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已是民國史研究中的陳舊話題，想要有所創新，殊屬不易。家近亮子不願拾人牙慧，或許正因為此，作者完全拋棄了革命史觀，而從一個合法性政權如何維持正當統治着眼，將結論鎖定於治國技巧，重新詮釋了國民政府失敗的根由。但作者將合法性的流失歸結於國民黨向基層社會滲透的技巧，用政治學合法性理論來衡量是難以完全說通的。人民擁有的公意是統治合法性的唯一基礎，是最高執政者應該忠於的最終價值，誰沒有公意，誰沒有體現廣大人民的意志，誰就是非法的統治者；反過來，誰掌握了公意，誰體現了人民的意志，誰就可以成為合法的統治者。

作為強力統治化身的蔣介石，即使擁有超強的軍事力量，但對社會各種力量的整合經常難如所願，從統治階層內部來看，蔣在處理地方實力派和黨內派系中，總是過多地依賴武力或秘密組織，這一點與中共比較或許可以發現問題的所在：中共的各個根據地雖然散處四方，但卻很少出現「槍指揮黨」或開獨立的地方實力派。張國燾即使想加冕稱王，也十分在意獲取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蘇俄及蘇共的認可。問鼎最高權力失敗的張國燾最後背棄了自己的信仰，這與其說是黨內殘酷鬥爭的結果，毋寧說是中共意識形態的專一，專一得容不下任何有損於黨內團結的異類思維的存在。這可能與中共作為革命黨而非執政黨，一直面臨較大的生存壓力有關。中共也有對馬克思主義不同的解釋體系，從建黨起就有所謂的「左」、右傾思想，但黨的至上凝聚力一直扎根於絕大多數黨員的心中。不管是「托派」，還是羅章龍等人建立的組織，各成員對馬列主義的信仰一直不曾動搖過。

與馬克思主義相比，三民主義沒有其體系完整；與列寧相比，孫中山沒有實現國家的統一；更重要的是，蘇聯革命為中共提供了成功的樣板，而國際上沒有以三民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國家，三民主義能帶來多大的效用，沒有現成的感性的革命經驗可資借鑑，這些都影響國民黨在全國各個階層、各種勢力中權威的樹立，也使三民主義在全國的指導地位難以得到共同的認可。在這種背景下，國民黨及三民主義要想走進千家萬戶，必須給普通民

眾，尤其是佔人口絕對多數的農民以看得見的物質利益，找準農民和統治者利益的交集，而這至少就涉及到在不同時間段，統治者施政最應傾向於哪個階層利益，即政權在某個階段階級屬性的問題。從體現人民意志獲取公意而言，三民主義的軍政、訓政與憲政的國家建設理論，遠不及中共的土地政策、減租減息等政策對農民的吸引力強，它們給廣大農民帶來了看得見摸得着的物質收益。

正因為此，家近亮子將合法性的流失歸結於國民黨向基層社會滲透技巧的生澀，並從多種體制內因素加以論證，以支撐這一結論，但因作者只看到了技巧的生澀，未分析技巧生澀的階級根源，其所得出的結論，雖能給人以一時的振奮，但不能使讀者完全無條件地信服。統治技巧確實重要，在一段時間甚至可以起主導作用，如大躍進運動儘管給整個農村帶來了嚴重後果，中共的國家權力卻藉着這場運動的推動，以罕有的規模急速地向社會各個領域擴張。但這種動員民眾的統治技巧，如果長期不能與人民的整體利益相耦合，技巧到底能夠走多遠是大可懷疑的。「文革」後期的「四五」運動就是明例，這是否是對官方動員的一種民間反動員？1978年後中共轉向改革開放，更能說明執政黨要想使自己的統治長治久安，僅僅掌握動員民眾和向基層社會滲透的技巧是遠遠不夠的。家近亮子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共的統治技巧為參照，但卻僅以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期的中共黨員數量和2000年改革開放已取得相當

成果的黨員和黨組織的數量為比較對象，可以清晰地發現，家近亮子即使採行下延比較法，也未能對中共五十餘年的執政根基做一整體分析，以中共上述兩個時間段為參照物所得出的國民黨失敗主要原因的結論，因而至少是有失全面和客觀的。

政黨的活力在於動員民眾，對民眾的動員在於持久，持久的動員在於經常地體現民眾的意志，所有這些在國民黨身上都能找到明顯的缺陷。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王子壯在日記中慨嘆：「近日政治會議人多而常會寥寥，是注重政治之趨勢，亦黨逐漸沒落之象也。」「今日之黨務，已趨末路，無計劃，無作法……勾心鬥角，更有何力量以對外作民眾工作。」這說明黨事相對於軍政而言，日益無足輕重，對三民主義理論的信仰在向對軍政實力的信仰傾斜。在傾斜之中，國民黨自身又未能和廣大下層民眾抱成一團，黨組織沒有力量對外作民眾工作自然是毫不足奇的。在這種狀況下，黨組織向基層社會的滲透即令有十分的技巧，也難以收穫一二分的成效。沒有廣泛的民眾支持，國民黨統治的合法性便喪失了穩固的根基，而動蕩的根基一旦遇見中共這個極其擅長民眾動員的強勁對手的挑戰，根基的土崩瓦解就遲早會來臨，1946-1949年國民黨加速度的崩潰正是對其改善弱勢群體生存環境長期失效的總清算。

歷史研究具有明確的主觀色彩，在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革命範式與現代化範式根本不可能存在範式轉換的否定性關係，而只可能存在一種並列或交叉的解釋關係，

與馬克思主義相比，三民主義沒有其體系完整；與列寧相比，孫中山沒有實現國家的統一；更重要的是，蘇聯革命為中共提供了成功的樣板，而三民主義的效用，沒有現成的感性的革命經驗可資借鑑。因此國民黨及三民主義要想走進千家萬戶，必須給普通民眾，尤其農民以看得見的物質利益。但三民主義的國家建設理論，遠不及中共的土地政策、減租減息等政策對農民的吸引力強。

政黨的活力在於動員民眾，對民眾的動員在於持久，持久的動員在於經常地體現民眾的意志，所有這些在國民黨身上都能找到明顯的缺陷。沒有廣泛的民眾支持，國民黨統治的合法性便喪失了根基，一旦遇見中共這個強勁對手的挑戰，根基的土崩瓦解就遲早會來臨，1946-49年國民黨迅速崩潰正是對其改善弱勢群體生存環境長期失效的總清算。

只不過各自突出詮釋的是中國近代社會進程的不同側面，《蔣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一書即再次說明了這一論斷。該書即使在論點的支撐方面，還有值得商榷之處，但家近亮子獨立思考的能力和不願人云亦云的學術創新精神，是任何從事民國史研究的人應該加以效法的，這種創新精神是學術研究永葆活力的驅動力量。

既然不存在一個統一的支配性的模式，就不應過於苛刻地要求一種範式一定要包容或反思另一種範式所造成的不足。從這個層面而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將此書引入國內出版發行，就不僅僅是看到了其研究視角與方法等方面的啟迪功效，有寄望於國內同行不斷出新之意，更展示了學術領域健康的兼容並包的心態。

《公共知識份子》評介

● 黃玫玲



波斯納 (Richard A. Posner) 著，韓文正譯：《公共知識份子》(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

知識份子是一個特殊的族群，操持着專業術語，引述科學統計數據，每日詮釋着社會發生的各種問題與現象，他們評論性和預測性的書籍、文章、電視、網絡、廣播等等隨處可見，剖析政經發展趨勢，提出政策建議，引領社會輿論。伴隨着民主政治與學科領域專業化的發展，具有專業的知識份子成為新興階級，進入政府參與統治，或者成為公共議題的代言人，搖身一變成為足以影響民意的重要人物。這種知識份子成為專業與公共議題代言的普遍現象，是知識份子時代的來臨？還是知識份子的消逝？《公共知識份子》(*Public Intellectuals: A Study of Decline*)一書的作者波斯納 (Richard A. Posner) 把這種以知識份子姿態公開寫作與演講，作品涉及